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社会语言学引论

Third edition

Ronald Wardhaugh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社会语言学引论

Third edition

Ronald Wardhaugh 著

祝畹瑾 导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2000-08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语言学引论/(英)沃德霍(Wardhaugh, R.)著;祝畹瑾导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8

ISBN 7-5600-1962-5

I.社… II.①沃… ②祝… III.社会语言学-概论-英文 IV.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185 号

English edition © Ronald Wardhaugh 1986, 1992,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of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Third Edition by Ronald Wardhaugh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It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本书由布莱克韦尔出版社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会语言学引论

Ronald Wardhaugh 著

祝畹瑾 导读

* * *

责任编辑:任小玫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650×980 1/16

印 张:27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5001—11000 册

书 号:ISBN 7-5600-1962-5/G·859

定 价:34.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文库



专家委员会

主任 王宗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润清	吴一安	李朋义	沈家煊	陆俭明
陈国华	胡文仲	胡壮麟	徐烈炯	桂诗春
顾曰国	戴炜栋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方立	王才仁	王立弟	王克非
王初明	王逢鑫	王嘉龄	史宝辉	宁春岩
田贵森	申丹	刘世生	朱永生	何兆熊
何自然	张绍杰	张柏然	张德禄	李宇明
李延福	李行德	李筱菊	杨永林	杨信彰
杨惠中	杜学增	汪榕培	邵永真	陈治安
周流溪	林连书	罗选民	姚小平	祝畹瑾
徐盛桓	秦秀白	贾玉新	顾阳	高远
高一虹	黄国文	惠宇	董燕萍	蒋祖康
韩宝成	蓝纯	潘永楹		

策划 霍庆文

Preface by Hallida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is to be congratulated on its initiative in making these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availabl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The books are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up-to-date writings on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by scholars who are recognized as leading authorities in their fields.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a broad range of materials in linguistics will greatly help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s into “English linguistics”,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so on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linguistics as a unified science.

The series is to be highly commended for what it offers to all those want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whether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r in applic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s language teachers. It is being launched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pursuing linguistic studie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succeed in meeting these new requirements.

M. A. K. Halliday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王宗炎序

近年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贸易急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外语、教外语、用外语的人多了；研究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开设这方面专业的高校也多了，语言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多了。就是不以此为专业，学习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也不乏其人。为了给从事这个专业的师生提供便利，同时又帮助一般外语教师、涉外工作者以及汉语研究者开阔思路，扩大视野，提高效率，我们献上这套内容崭新而丰富的丛书——英文版《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文库首批推出 54 部外国英文原著，它覆盖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6 个分支学科。这批书是我们与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反复研究之后精选出来的。出版这样大规模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丛书，这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这样做，抱着什么希望呢？总的说来，是遵循教育部关于加强一级学科教育的指示，在世纪之交，推出一套书来给中国的外语教育领航，同时也给一般外语工作者和汉语研究者提供信息，拓宽思路。

我们希望这个文库能成为进一步带动外语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发动机；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运载当代外国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教学方法来到中国的特快列车；我们希望，有了这套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师生就能顺利地进行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读这套书，青年外语教师和外语、汉语研究者能迅速把能力提高，把队伍不断扩大。

以上是我们的愿望，可是从广大读者看来，这个文库是否真的有出台的必要呢？我们想，只要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客观情况，就知道这套书有填空补缺的作用，是让大家更上一层楼的

扶梯。

我们跟许多人一样，认为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是成绩斐然的，但是某些不足之处也无庸讳言。

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大量工作还等着大家去做。汉语语法研究，过去由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已经成绩卓著，可是现在虽则引进了功能主义，还看不出什么出色的成果。语料语言学是新兴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机器翻译从50年代就有人搞，然而其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

在语言理论方面，我们不时听到一些片面的、所见不全的论调。有人说，1957年前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理论语言学，其创始者是Chomsky；也有人说，语言纯属社会文化范畴；还有人说，搞语言研究只有量化方法才是科学方法，定性方法不值得一提。

谈到外语教学，某些看法、做法是分明不值得赞许的。有人以为交际教学只管听说，不管读写，也有人以为教精读课就是教阅读，不管口语。在分析课文时老师满堂灌，学生开口不得，是常见的；教听力课时老师只管放录音，对学生不给半点提示点拨，也并非罕有现象。

上述这些缺点，我们早有所知，现在我们更加明白，必须力图改进，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了。为了改进，我们就得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借鉴国外的有效措施。眼前这个文库，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结果。

在编辑这个文库时，我们在两方面下了功夫。

一方面，在选书时，我们求全，求新，求有代表性和前瞻性。我们不偏爱一家之言，也不只收一家外国出版社之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主干学科固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分支学科可也不忽视。语料语言学、语言统计学是新兴学科，我们收入了专著；句法学、语义学久已有人研究，我们也找到了有关的最新著作。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为各书撰文导读，为读者铺平道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

著包罗宏富，初学者读起来可能觉得茫无头绪。为了助他们一臂之力，本文库中每一种书我们都请专家写了一万字左右的导读材料。哪怕书中内容比较陌生，谁只要在读书前看一下导读材料，读书后把材料再看一遍，一定能弄清脉络，掌握要点。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向爱好泛读的人们提个建议。语言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靠语言与他人协作；通过语言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利用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语言又反过来表达着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充当的各种角色。学一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语言意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利的。我们不妨把此事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自己的日程。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王宗炎

中山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导 读

一

Ronald Wardhaugh 著的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Third Edition) (《社会语言学引论》第 3 版, 1998) 是同类教科书中篇幅最长的一本, 参考文献目录就达 560 条。该书内容牵涉面广, 包括: 讨论学科的性质、范围、研究方法 (第 1 章) 和理论问题 (第 16 章); 论述主要的术语 (第 2、5 章); 皮钦语 (pidgin) 与克里奥耳语 (creole) (第 3 章); 宏观社会语言学 (第 4 章) 和微观社会语言学 (第 6、7、8 章); 同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用学交叉的谈话研究 (第 10、11、12 章); 语码转换 (第 4 章); 语言与文化 (第 9 章); 语言与性别 (第 13 章); 社会语言学的应用 (第 14、15 章) 等。每一章的开头有一段引言, 指明本章的主题。每一节的结尾有详细的讨论题, 其中不乏本文中未提到的要点。这部分和每一章末列的推荐书目为进一步研究有关课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本书与初版 (1986)、第 2 版 (1992) 的本子相比, 在皮钦语与克里奥耳语、语码转换、语言变异、语言演变、谈话分析、性别与语言等章节中都作了一些修改, 增添了新材料特别是有异议的观点。可见, 新版本试图反映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动向。

对于这样一本范围宽泛、内容繁杂的专业书, 在一篇文章中很难做到全面介绍。下面我只能就我认为应当提醒读者特别注意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二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社会现象的学科。关于“语言”, 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考察、解释。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不是语言的核心部分——它的结构体系, 而是语言的边缘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现。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不仅表达思想而且载有社会意义。这就是

说，使用中的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会相互作用并且产生社会效应。

语言与社会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社会语言学所要解答的中心问题。一般说来，研究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的，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小群体的言语特征及其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称为微观社会语言学。然而由于目标和旨趣各异，有些学者宁可称宏观社会语言学为语言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有些学者则认为惟有变异研究（variation study）才是正统的社会语言学。本书采取兼容的态度，便于我们了解学科的全貌。问题在于：本书除了上述两部分内容之外，还包含了大量有关谈论分析的论述，却没有交待清楚其中的内在联系。这是不是因为对不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内的话篇分析先导的学说讲得多了些而对谈话研究自身的发展讲得少了些的缘故？下面我们分为3个部分来介绍。

三

早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大多偏重宏观方面。弗格森写的 *Diglossia*（《双言》，曾译为《双语体》，1959）是一个里程碑。他发现，在一些国家里，并存两种功能迥然不同的语言变体（variety），即在方言（标准的和地域的）之外还存在一种上置变体（superposed variety）。他称前者为“低级”变体（简称L），称后者为“高级”变体（简称H）。人人都会说L，但H必须通过正规教育才能学会。双言是一种持续稳定的语言状态。拥有许多用H写就的古典文学作品，平民没有机会受教育，法律保护征服者的语言优势，大众公认H比L优越，这些社会因素都会促成双言状态并使其长期保持下去，而改变这种语言体制则要依靠社会变革乃至政治斗争。

在另一些国家中也有类似H与L而在不同社会领域（domain，如宗教、教育、家庭等领域）里使用的语言。例如：在巴拉圭，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会讲西班牙语（官方语言）和瓜拉尼语（民族语言），并且知道在什么场合该用什么语言。菲什曼认为这类稳定的双语现象也可称为双言（广义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古典的双言社会里，人人都以L为第一语言；在延伸的双言社会里，也有人以H为第一语言，而且L与H不是同一谱系的。以后又有学者提出存在多言社会，如马来西亚。“双言”和“领域”这两个概念一直是分析宏观的语言形态及其功能的有用工具。

在常人眼中，地方话比标准语粗俗，不能上大雅之堂。而豪根指出，方言与语言之间的区分情况十分复杂。从语言史来看，一国的共同语往往是在其政治、文化中心的方言基础之上形成的，某个地域方言一旦被发展成为标准语，其他方言就处于从属地位。世界各地有许多实例表明，语法结构相似的变体由于处在不同的国家而被命名为不同的语言。相反，互不相通的语言变体在一个国家里却被命名为不同的方言。由此可见，什么叫语言，什么叫方言，是由历史、政治、社会因素决定的。豪根的论断使人们认识到语言地位的高低完全是外加的。

在宏观社会语言学领域中，菲什曼堪称领路人。早在 50 年代末，他就在宾州大学社会学系开过一门课，叫做“语言的社会学”。他编辑了几部有深远影响的文集，如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68), *Advance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 vols. (1971~1972), *Advanc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974),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Societal Multilingualism* (1978)。他还一直担任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的主编。他的论著涵盖双语及多语社会、双语教育、少数民族对优势语言的态度、移民集团的语言维持 (language maintenance) 和语言更换 (language shift)、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这些以及语言扩散、语言冲突、语言融合、语言消亡等课题代表着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向。

四

由拉波夫开创的语言变异研究在六七十年代蓬勃兴起，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主体。

变异研究的基本观点如下：现实生活中人的语言表现多种多样，没有人总是用单一的语体 (style) 说话；任何活生生的语言都有变异形式，然而变异不是无拘无束的，它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当然也受到语言构造规则）的制约；尽管个人之间的变异表现有所不同，作为群体言语特征的变异现象总有一定的模式。

变异研究的方法脱胎于方言地理学。调查地域方言的地点主要在农村，调查对象仅限于少数挑选出来的发音“纯正”的人，调查者听他们念词表，记下音来，然后依据从各地搜集到的资料，在方言地图上绘制一条同言线，把有同一现象的区域跟没有这一现象的区域分隔开，用这样的办法来标定地域方言的界限。拉波夫跳出传统方言学的框框，率先

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方言调查。他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抽样调查和统计法）确定调查对象，量化语言变项（variable，发音上的变异形式）和社会变项（发音人的阶层、年龄、性别、民族等属性），通过定量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correlation），即：当社会变项的值发生变化时，语言变项的值也会按一定的趋势发生变化（注意：这不能理解为因果关系）。

在搜集语料的方法上，拉波夫提出了不少问题并且想出了不少解决的办法。例如：他用快速隐名调查法克服“观察者的矛盾”，使调查对象察觉不到在受询问以避免说话不自然；让受访人说说自己差一点要死掉的经历，转移其注意力而使其运用随便说话语体。资料显示：受访人在念词表、念语段、留意说话、随便说话等不同的语境中，发音有变化。

在拉波夫范式的引导下，变异研究成果累累。语言变项从语音扩展到语法、词汇、惯用法、语体等；研究对象从最初偏重于劳工阶层和少数民族发展到今日，性别之间的语言差异成了热门课题。拉波夫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语言的本质，而且对于抵制美国学校对黑人英语的歧视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往语言学家认为，研究语言演变只能观察到变化的结果而观察不到变化的过程。拉波夫在对马萨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音变的研究中，把某双元音央化现象在年龄段上的分布情况同过去该地区的方言调查记录相对照，推断出这个音所经过的历时变化阶段。研究还表明，央化程度的回升与岛民不喜欢外来者的侵扰有关系。

拉波夫根据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总结出不少有用的理念：

关于言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 他强调划分言语社团的标准不仅在于说话人有没有同样的言语特征，而且要看说话人对于变异体（variant）的态度和评价相同与否。

关于语言变项 他称：当一个从少数人中开始的创新形式扩散到亚群体全体成员后，这个变项就成为该亚群体的指示项（indicator），此时它还不显示语体上的差异，也不体现社会评价。当别的亚群体把它视为标准形式而采用后，这个变项就成为言语社团的标志项（marker），它会随语体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且体现社会价值。如果创新的那个亚群体在言语社团内处在下层，这一形式可能遭到社会的蔑视而成为粗俗项（stereotype）。指示项没有外加的社会意义，粗俗项凝固不变。惟有标志项不仅体现社会声望而且存在语体变异，这表明这个语言形式还在变化

当中，因而它是变异研究的对象。

语音变化的机制 音位变异体的扩散在有的阶段是社会未意识到的，如从创新发展成为指示项期间；在有的阶段则是社会所意识到的，如成为标志项后，此时人们会自觉地改变自己的发音向有声望的形式靠拢。在社会各阶层当中，变异体的分布态势通常是：阶层越低或说话语体越随便，非标准音出现的频率越大；而阶层越高或说话语体越正式，则非标准音出现的频率越小。劳工阶层和中产阶层之间出现的音位分化，有的显著，有的细微。最令人注目的现象是，中下阶层中的中年人群发标准音的频率超过了中上阶层中同类人群发标准音的频率，即出现超越模式（crossover pattern）。缘由在于：中下阶层中的这个人群因渴望跻身于中上阶层而纠正自己的非标准音过了头。

上述机制所反映的是都市里社会方言的分布情况及其变化趋势。米尔罗伊认为，在比较封闭的社会里，以个人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作为考察语言变异的社会单位更为合宜。调查表明：在劳工阶层中，紧密的网络关系对个人会产生凝聚力和约束力，形成自身的言语行为标准。在这样的交往圈子里，保持土音会显得更加融洽。而新形式一般是由那些同几个群体有着松懈网络关系的人首先采用的。

许多变异研究的成果显示，在语言演变中，究竟是哪个阶层或群体站在前列，没有一成不变的定论。关键在于有没有驱动力，能不能获得好处。

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语言变异固然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群体的言语特征，然而群体内部存在的语言差异却被统计所使用的平均值给掩盖了。沃尔弗拉姆指出：变异研究发展到今日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群体内个人的语言表现与群体的模式之间是有差距的，然而个人的变异在描写语项与社会因素共变时却被排除在外。说话人在谈话的不同时刻可能使用多个变异体，并且不一定是为了要让自己显得像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也许这只是个人性格的表露。

沃尔弗拉姆和希林—埃斯蒂合写的 *American English: Dialects and Variation* (1998) 是最新的一本语言变异研究教科书，值得读者参阅。

五

说话人的语言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要变化，这些问题成了 80 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关注的一个焦点。

人与人交谈时，社会因素与语用使用怎样相互作用，这方面的研究是由社会心理学者首先展开的。布朗和吉尔曼在 1960 年发表的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详尽地分析了一些欧洲语言中第二人称代词单数 Tu 和复数 Vous 的语义演变历史和使用模式，揭示称呼代词的用法既受民族文化、社会结构和集团意识的制约，又与交谈者之间的地位差距和亲疏关系相呼应。他们指出：社会阶层的特性（体现在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教育水平、政治观点等许多方面）会在长时期内决定一个人的语言行为，但是说话人有时选择的称呼代词会明显地偏离集团的规范和平时的习惯，这表明说话人的情感或态度发生了暂时的变化。他们用“权势 (power)”和“同等 (solidarity)”这两个无法再抽象的概念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注意：权势是指一个人因在某方面如体力、财富、年龄等处于优势而能够控制另一个人的行动；同等是指两个人有共同点，如：上同一所学校，父母相同）。这两个概念对许多社会都适用，尽管各个社会显示权势或同等关系的做法不尽相同。

贾尔斯等心理学者从实验中观察到，说话人为了要获得对方的赞同或提高交际效率，有时候调整自己的言谈风格（包括口音、讲话的速度、手势等）去同对方的风格保持一致。也有相反的例证：说话人有意突出自己同对方不同的风格以拉开距离或者表明自己不属于对方语言所代表的群体。他们提出“言语顺应理论 (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来解释说话人在语体上与听话人趋同或偏离的现象。还有的实验表明，说话人采取何种方式取决于对听话人的评价。贝尔进而量化语体变项并将听众分成直接的听众和间接的听众，提出所谓“听众设计 (audience design)”模式，即说话人的言谈风格视听众的特点而定。这就更加直截了当地把听众放在了引起语言变化的首位。

在 60 年代前期，欧文—特里普、冈珀兹等人曾经用实例表明谈话的情景因素（场合、话题、谈话人之间的角色关系）怎样影响谈话人的语言使用。那个时期的研究还处在静态描写阶段，中心任务是要弄明白“谁在何时何地用何语言向谁说话”才是协调的、合乎社会惯例的。进入 70 年代后期，研究者越发重视从理论上探索为什么说话人要选择某种方式谈话，重心从以听话人为主导转向以说话人为主导。

海默斯是首位在理论上作出贡献的社会语言学家。他提出的交际能力学说已深入人心。海默斯原本是人类学者，他倡导的交际民族志学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以描写交际事例为己任。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描写框架内包含“目的”和“规范”两项。他认为在交

际行为的深层存在着潜在的谈话规则和社会—文化规范，这是用以构成民族的或群体的文化所不可分割的部分。

布朗和莱文森在比较研究了3个民族的谈话语料之后，指出：许多言语行为蕴涵一个共同点即“照顾面子”。所谓“面子”，按照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诠释，指的是公开的自我表象（public self-image）。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不希望丢面子。自己不损害他人的面子，他人也就会照顾自己的面子。他称这是做保全面子的工作（face-work）。布朗和莱文森把面子分成积极的面子（指希望得到他人的赞同）和消极的面子（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他们指出，许多言语行为实际上是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而注意礼貌则可以减轻或消除对听话人面子的潜在威胁。威胁面子的行为的严重程度取决于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权势悬殊程度和FTA在特定社会里所具有的强加性的值。在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之间，构成威胁面子的行为的因素以及表达礼貌的谈话方式都会有差异，然而为了使谈话成功，说话人相互合作，采取礼貌策略（通常是下意识的），这应该说是谈话所普遍遵循的原则。

社会学家加芬凯尔倡导的民族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认为谈话同社会一样有序并且蕴含一定的规则和技巧。要了解人跟人怎样谈话并且怎样理解彼此的意思，需要依赖谈话人自己凭经验中获得的常识进行实际的推理。绝大部分的表达方式是标志性的（indexical），它们的意思要经过交流才得以表现出来。在交谈过程中，话语本身既是信息同时又是直接的语境（immediate context）。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斐逊根据这一理论开辟了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简称CA）领域。他们从大量的自然发生的谈话语料中提炼出许多反复出现的会话结构形式。这一学派的研究方法与变异研究的方法背道而驰：不是在事先选定的变项之间寻找关联，不考虑谈话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不作定量分析，不下概括性的结论，而是一个话步（move）接着一个话步地弄清楚序列（sequence）之间的关系。

在CA学派面世之前，不论是非什曼提出的“研究谁在何时用何种语言向谁说话”，还是拉波夫主张的“研究社会环境中的语言”，都仅关注外在的由社会—文化因素或者交际因素所构成的环境与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现在环境就体现在连续的互动的话语中，研究者纷纷把目光转移到谈话内部，站在说话人的立场上体察语言形式变化的意义。CA学派严格地说不在社会语言学范畴之内，但是它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却很大。

六

冈珀兹在 70 年代初期研究挪威的方言时，发现说话人从使用某一方言转而使用另一方言是有社会意义的。他指出存在两类语码转换：情景型，即由于情景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的语码转换；喻义型，指说话人为了改变语气或同对方的角色关系而转换语码。在此之前，语言学家并不认识语码转换现象，研究语言接触的学者把在一段话里出现两种语言的现象看成是语言干扰的结果。而事实上，双语人在谈话当中转换语码是有用意的。有哪些因素促成语码转换？语码转换起什么作用？受什么制约？这些都已成为研究语言变化的重要课题。迈尔斯—斯科顿用“标记性模式 (Markedness Model)”来解释语码转换的动机和功能。她将在特定的情景中使用符合规范的语码称为未标记的选择，这表示说话人愿意维持现有的身份 (identity)；而将偏离未标记的选择称为标记的选择，这表示说话人要改变在谈话此刻所处的位置。这一模式的核心思想在于：说话人是有理智的行动者 (a rational actor) ——“我选择 X，因为我希望达到 Y (获得最佳回报)”。有关这一模式的论证及对其他种种理论模式的剖析，参阅迈尔斯—斯科顿著 *Social Motivations for Codeswitching* (1993)。

80 年代初期冈珀兹在 *Discourse Strategies* 一书中提出一个新的术语叫“语境化暗示 (contextualization cue)”。这是指说话人在谈话过程中通过转换语码、变化韵律、使用某些词项和句法结构等手段向听话人传递喻义信息。怎样解读置于语境中的意思 (the situated meaning) 呢？研究者假定谈话人对交往活动总有个大致的想法：交往是关于什么事情的，有什么期望。在这个“框框 (frame)”或“图式 (schema)”的界限内，谈话人凭着自己的经验及对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就谈话中对方所给予的信号，推断其含义，然后作出相应的反应。对方对于所给的暗示也加以推断并且根据自己的理解调整谈话策略，经过反复“磋商 (negotiation)”，最终谈话各方对于交往要达到什么目的以及怎样进行下去达成共识。如果谈话人彼此不了解对方的文化传统及谈话规则，那么就会产生信息误传和误解而导致交际失败。冈珀兹给他从事了近十年的话篇分析起名为“交往社会语言学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它的课题广泛，有医生与病人的对话、法庭审讯、求职面试、异族人之间的交谈、男女交谈等等。对于这个已经确立了的社会语言学分支，本书却

没有专门介绍，是不是美中不足？

目前，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正在往个人化的方向推进。群体的社会属性固然与语言变化有关联，但毕竟不是激发变化的直接原因。一个人也许同时归属于许多言语社团，甚至在一次谈话中也可能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面貌（persona）、调整自己的身份。用言语社团作为划分说话人的基本单位已越发说不清楚。有鉴于此，注重个人的言语特质及谈话中的动态变化，从说话人身上寻求语言变化的起因，这一趋向已日益明显。

七

社会语言学有没有理论？国内外都有人质疑。这个问题牵涉到对“理论”的理解。

社会语言学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不论从哪个视角来研究社会语言现象，都必须以语言事实为依据。从对事实的调查、观察开始，加以归纳分析，从中总结出能够解释观察对象之间关系的概括性理论。社会语言学家迄今为止已经确立了不少基本概念和模式。所谓“概念”，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毛泽东语）。“模式”则是指导人们观察事物的基本理论框架，指出了寻找答案的途径。应该说，社会语言学在理论方面是有成就的，现在连语言学家也不能全然不顾社会语言学家从纷繁的语言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原则了。

社会语言学在个别的层面上、在局部范围内，有各种理论，有无穷无尽的数据，也有重要的发现，然而确实缺乏一种统辖全局的学说。这个问题与学科的研究对象有关系。使用中的语言变幻莫测，社会错综复杂，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使得这门学科不可能有涵盖一切的理论。我同意本书作者的观点，不把它视为社会语言学的致命弱点。这也许正是这门学科至今仍然生机勃勃的一个重要原因。